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

名著译丛

方文主编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表征



本译丛博采海内外众多社会心理学名家意见，纵览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各主导范式，从中精选十部。各书作者或筚路蓝缕，莫立崭新范式；或推陈出新，赓续煌煌学统。各书编选译，经年有成，值此中国转型大时代，惟望借取新知，拓展视野，增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之“文化自觉”。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Serge Moscovici) / 著
管健 高文珺 俞容龄 / 译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

名著译丛

方文主编



SOCIAL REPRESE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表征



本译丛博采海内外众多社会心理学名家意见，纵览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各主导范式，从中精选十部。各书作者或筚路蓝缕，莫立崭新范式；或推陈出新，赓续煌煌学统。各书编选译，经年有成，值此中国转型大时代，惟望借取新知，拓展视野，增进中国社会心理学之“文化自觉”。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Serge Moscovici) / 著
管健 高文珺 俞容龄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表征 / (法) 莫斯科维奇著; 管健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300-13012-5

I. ①社…

II. ①莫…②管…

III. ①社会心理学

IV. ①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20242 号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方 文 主编

社会表征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 著

管 健 高文珺 俞容龄 译

Shehui Biaozhe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5mm 16 开本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5.25 插页 1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55 00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编委会

学术顾问

康萤仪教授(Hong Ying-yi)(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系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王登峰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乐国安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赵志裕教授(Chiu Chi-yue)(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心理学系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周晓虹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编委会

戴健林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邓治文副教授(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管健副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侯玉波副教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金盛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寇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李丹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李强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刘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马华维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潘宇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新建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杨宜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张建新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

赵旭东教授(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佐斌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方文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自觉”的阶梯

——“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总序

方文

只有一门社会心理学。它关注人之认知、情感和行为潜能的展现，如何受他人**在场**（presence of others）的影响；其使命就是激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去超越**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的羁绊，以缔造其动态、特异而完整的丰腴生命。但他人**在场**，已脱离**奥尔波特**（G. W. Allport）原初的**实际在场**（actual presence）、**想象在场**（imagined presence）和**隐含在场**（implied presence）的微观含义，可从**共时—历时**和**宏观—微观**两个维度进行重构，以含括**长青**的研究实践和不断拓展的学科符号边界（方文，2008a：137）。社会心理学绝不是哪个学科的附属亚学科，以从容开放的胸怀，持续融汇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智慧，逐渐建构和重构自主独立的学科认同和概念框架，岸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学问。

在不断建构和重构的学科历史话语体系中，社会心理学有不同版本的**诞生神话**（myth of origin），如1897年**特里普里特**（Triplet）有关**社会促进/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的实验研究，1908年**两本**偶然以社会心理学为题的教科书，或1924年**大奥尔波特**（F. H. Allport）的权威教材。这些诞生神话，蕴涵可被解构的意识形态偏好和书写策略。援引**学科制度视角**（方文，2001），这门新生的**社会/行为科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认同，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于北美得以完成。而北美社会心理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年代声望日盛，成就其独断的符号霸权。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图景和演进画卷，展开在此脉络中。



1967年：透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时间线索

黑格尔说过，一切哲学也就是哲学史。哲人道破学科史研究的秘密：滋养学术品位。但在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谱系中，学科史研究一直地位尴尬，远不及人文学科。研究学科史的学者，或者被污名化：自身没有原创力，只能去总结梳理他人的英雄故事；或者是学问大家研究之余的闲暇如成长过程的记录。而在大学的课程设计中，学科史也成为二等课程，大多数被简化为具体课程中的枝节，在导论里一笔带过。

学科史研究，对品位的滋养，从几方面展开。第一，它在无情的时间之流中确立学科演化路标：学科的英雄谱系和经典谱系。面对纷繁杂乱的研究时尚或招摇撞骗的学界名流，它是最简洁而高效的解毒剂。第二，它作为学科集体记忆档案，是学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当学子领悟到自身正置身于那些非凡而勤奋的天才所献身的理智事业时，自豪和承诺油然而生。而学科脉络中后继的天才，就从中破茧而出。第三，它也是高效的学习捷径。尽管可向失败和愚昧学习，但太浪费了；而向天才及其经典学习，是最佳的学习策略。第四，它还可能为抽象的天才形象注入温暖的感性内容。而这感性，也正是后继者求知的信心和努力的动力。

已有四种通常线索、视角或策略，被用来观照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演化。学科编年史，或者学科通史是最为常用的策略；学派的更替是第二种策略；不同年代研究主题的变换是第三种策略；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则是第四种策略。

还有一些新颖的策略在被尝试。支撑学科理智大厦的核心概念或范畴在不同时期杰出学者视域中的意义演化，即概念史或范畴史，是一种新颖独特但极富难度的视角；而学科制度视角，以学科发展的制度建设为核心，也被构造出来（方文，2001）。这些视角或策略为洞悉学科的理智进展提供了丰厚洞识。

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则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的活动为主线，贡献了其大历史的观念。黄先生聚焦在“无关紧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587年, 或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2007)。黄先生条分缕析, 洞悉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大明王朝若干年后崩溃的所有线索, 在这一年都可以找寻踪迹。

剥离其悲哀意味, 类似地,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命运, 也可标定一个“无关紧要的一年”: 1967年。它关联两个基本事件和三个英雄人物。

两个基本事件。第一是1967年前后“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的兴起, 第二是1967年前后开始的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危机话语的兴起及其应对, 终结了方法学的实验霸权, 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逐渐成为共识。而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理智复兴, 则终结了北美主流“非社会的”社会心理学(asocial social psychology), “社会关怀”成为标尺。这两个事件之间亦相互纠缠, 共同型塑了其当代理论形貌和概念框架(Moscovici and Marková, 2006)。

三个英雄人物。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象征, “社会心理学的教皇”(the Pope of Social Psychology) 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19—1989), 在1967年开始对社会心理学萌生厌倦, 正准备离开斯坦福大学和社会心理学。一年后, 费斯廷格终于成行, 从斯坦福大学来到纽约的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主持有关运动视觉的项目。费斯廷格对社会心理学的离弃, 是北美独断的符号霸权终结的先兆。

而在同一年, 主流社会心理学界还不熟悉的泰弗尔(Henri Tajfel, 1919—1982), 这位和费斯廷格同年出生的天才, 从牛津大学来到布里斯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UK)。他从牛津大学的讲师变成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心理学的讲席教授(Chair Professor of Social Psychology)。

而在巴黎, 和泰弗尔同样默默无闻的另一位天才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 1925—)正在孕育少数人影响(minority influence)和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的思想和研究。

从1967年开始, 泰弗尔小组和莫斯科维奇小组, 作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理智复兴的动力源和创新中心, 在“社会关怀”的旗帜下, 开始一



系列独创性的研究。

社会心理学的当代历史编纂家，会铭记这一历史时刻。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世界图景从那时起开始慢慢重构，北美社会心理学独断的符号霸权开始慢慢解体，而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学科成就，在新的水准上也开始孕育和完善（方文，2008a：3）。

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的建构：解释水平

教科书的结构，是学科概念框架的范例表征。在研究基础上获得广泛共识的学科结构、方法体系和经典研究案例，作为学科内核，构成教科书的主体内容。教科书，作为学科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是学科知识传承、学术社会化和学科认同建构的基本资源和主要媒介。特定学科的学子和潜在研究者，首先是通过教科书获得有关学科的直观感受和基础知识的。而不同年代权威教科书的内容变迁，实质上负载特定学科理智演化的基本线索。

在杂多的教科书当中，有几条标准可帮助辨析和鉴别其优劣。第一，教科书的编/作者是否是第一流的研究者。随着学科的成熟，中国学界以往盛行的“教材学者”，已经淡出；而使他们获得声望的所编教材，也逐渐丧失价值。第二，教科书的编/作者是否稟赋理论关怀。没有深厚的理论关怀，即使是第一流的研究者，他/她也只会专注于自己所感兴趣的狭隘领域，没有能力公正而完备地展现和评论学科发展的整体面貌。第三，教科书的作者是否有“文化自觉”的心态。如果负荷文化中心主义的傲慢，编/作者就无法均衡公正地选择研究资料，而呈现出对自身文化共同体的“单纯暴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缺失文化多样性的感悟。

直至今日，打开绝大多数中英文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的目录，只见不同研究主题杂乱无章的并置，而无法明了其逻辑连贯的结构。学生和教师大都无法领悟不同主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也无法把所学所教内容图式化，使之成为自身特异的知识体系中可随时启动的知识组块和创造性资源。这种混乱，是对社会心理学学科身份的误识，也是对学科概念框架

的漠视。

如何统合纷繁杂乱但生机勃勃的研究实践、理论模式和多元的方法偏好，使之归于逻辑统一而连贯的学科概念框架？有深刻理论关怀的社会心理学大家，都曾致力于这些难题。荣誉最终归于比利时出生的瑞士学者杜瓦斯。

在杜瓦斯之前，美国社会心理学者，2007年库利—米德奖(Cooley-Mead Prize)得主豪斯也曾试图描绘社会心理学的整体形貌(House, 1977)。豪斯所勾画的社会心理学是三头怪物：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 SSP)、实验社会心理学(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ESP)和语境社会心理学或社会结构和人格研究(contextual social psychology, CSP;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曾经被误解为两头怪物的社会心理学，因为豪斯更加让人厌烦和畏惧。

但如果承认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使是在既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能动性，在行动中对社会过程和社会实在进行情景界定和社会建构的社会心理过程的首要性，就凸显出来。换言之，社会心理过程在主观建构的意义上对应于社会过程。

杜瓦斯在《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这部名著中，以解释水平为核心，成功重构了社会心理学统一的学科概念框架。杜瓦斯细致而合理地概括了社会心理学解释的4种理想型或4种解释水平，而每种解释水平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生发相对应的研究主题(Doise, 1986: 10-17)。

(1) 水平1——个体内水平(intra-personal or intra-individual level)。它是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解释水平。个体内分析水平，主要关注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组织其社会认知、社会情感和社会经验的机制，并不直接处理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

以个体内解释水平为核心的个体内过程，可包括基本研究主题：具身性(embodiment)、自我、社会知觉和归因、社会认知和文化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态度等。



在这一解释水平上，社会心理学者已经构造一些典范的理论模型，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双过程模型，如精致化可能性模型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与启发式加工—系统加工模型 (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HSM)，和希金斯的知识启动和激活模型 (Higgins, 1997)。

(2) 水平 2——人际和情景水平 (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level)。它主要关注在给定的情景中所发生的人际过程，而并不考虑在这特定的情景之外个体所占据的不同的社会位置 (social positions)。

以人际水平为核心的人际过程，可包括基本研究主题：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亲和与亲密关系、竞争与合作等。其典范理论模型是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论。

(3) 水平 3——社会位置水平 (social positional level) 或群体内水平。它关注社会行动者在社会位置中的跨情景差异 (inter-situational differences)，如社会互动中的参与者特定的群体资格或类别资格 (different group or categorical membership)。

以群体水平为核心的群体过程，可包括基本研究主题：大众心理、群体形成、多数人的影响和少数人的影响、权威服从、群体绩效，领导—部属关系等。

其典范理论模型是莫斯科维奇有关少数人影响的皈依模型 (conversion theory)，多数人和少数人影响的双过程模型和社会表征论 (Moscovici, 2000)。

(4) 水平 4——意识形态水平 (ideological level) 或群际水平。它是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解释水平。它在实验或其他研究情景中，关注或考虑研究参与者所携带的信念、表征、评价和规范系统。

以群际水平为核心的群际过程，可包括基本研究主题：群际认知如刻板印象、群际情感如偏见、群际行为如歧视及其应对。

在过去的 30 年中，群际水平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主宰性的理论范式由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所启动，并深化到文化认同的文化动态建构论 (dynamic constructivism) (Chiu & Hong, 2006; Hong et al.,

2000; Wyer, Chiu & Hong, 2009) 和偏差地图模型 (bias map) (Cuddy et al., 2007; Fiske et al., 2002) 中。

社会理论大家布迪厄曾经讥讽某些社会学者的社会巫术或社会炼金术，他们把自身的理论图式等同于社会实在本身。英雄所见！杜瓦斯尤其强调的是，社会实在在何时空场景下都是整体呈现的，而不依从于解释水平。社会心理学的4种解释或分析水平只是逻辑工具，绝不是社会实在的4种不同水平；而每种分析水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们都只是对于整体的社会实在某种面向的研究；对于整体的社会实在的整体把握和解释，有赖于4种不同的分析水平在同一水平或不同水平上的联合 (articulation) (Doise, 1986: 11-16)。

这4种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社会心理过程，从最为微观也最为心理学化的个体内过程到最为宏观也最为社会学化的群际过程，是对整体的社会过程不同面向和不同层次的相应表征。

以基本社会心理过程为内核，就可以勾画社会心理学逻辑连贯的概念框架，它由5部分所组成：

1.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演化、世界图景和符号分层。
2.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体系。
3. 不断凸显的新路径。它为生机勃勃的学科符号边界的拓展预留空间。
4. 基本社会心理过程。
5. 社会心理学在行动中：应用实践的拓展。

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从二战开始，就从两个方面向应用领域拓展。第一，在学科内部，应用社会心理学作为现实问题定向的研究分支，正逐渐地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来直面和应对更为宏大的社会问题，如健康、法律、政治、环境和组织行为。

第二，社会心理学有关人性、心理和行为的研究，正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认知社会心理学家卡尼曼 (Kahneman, D.) 因为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而与另一位学者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社会心理学家在近40年中第3次获此殊



荣。在此之前，社会心理学家洛伦茨（Lorenz, K.）、廷伯根（Tinbergen, N.）和冯·弗里契（von Frisch, K.）有关动物社会行为的开创性研究于1973年分享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西蒙（H. Simon 自取中文名为司马贺，以向司马迁致敬）因有关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次优决策或满意决策（sub-optimum decision-making or satisficing）的研究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诺贝尔奖项中，并没有社会心理学奖。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荣膺大奖的社会心理学家，也许只是十年一遇的杰出学者，还不是百年一遇的天才。天才社会心理学家如费斯廷格、泰弗尔、莫斯科维奇和特里弗斯（Trivers, R.）等，他们的理论，在不断地触摸人类物种智慧、情感和欲望的限度。在这个意义上，也许任何大奖包括诺贝尔奖都无法度量他们持久的贡献。但无论如何，不断获奖的事实，从一个侧面明证了社会心理学家群体的卓越成就，以及社会心理学的卓越研究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典范意义。

杜瓦斯的阐释，是对社会心理学统一概念框架的典范说明。纷繁杂乱的研究实践和理论模式，从此可以被纳入逻辑统一而连贯的体系之中。社会心理学直面社会现实的理论雄心由此得以释放，它不再是心理学、社会学或其他什么学科的亚学科，而是融会相关理智资源的自主学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

已有社会心理学大家来系统梳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理智进展（如乐国安，2009；周晓虹，1993；Burke，2006；Kruglanski & Higgins，2007）。以杜瓦斯所勾画的社会心理学的概念框架为心智地图，也可尝试粗略概括支配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范式，这些主宰范式主要体现在方法创新和理论构造上，而不关涉具体的学科史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

1. 方法学领域：社会建构论和话语社会心理学的兴起

作为学科内外因素剧烈互动的结果，“社会心理学危机话语”在20

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登场，到20世纪80年代初尘埃落定（方文，1997）。在这段时间，社会心理学教科书、杂志和论坛中充塞着种种危机论的悲观论调，甚至有的更为激进——“解构社会心理学”（Parker & Shotter, 1990）。“危机话语”实质上是社会心理学家群体自我批判意识的兴起。这种自我批判意识的核心主题，就是彻底审查社会心理学赖以发展的方法学基础即实验程序。

危机之后，社会心理学已经迈入方法多元和方法宽容的时代。实验的独断主宰地位已经消解，方法体系中的所有资源，正日益受到均衡的重视。不同理智传统和方法偏好的社会心理学者，通过理智接触，正消解相互的刻板印象、偏见甚至是歧视，逐渐趋于友善对话甚至是合作。同时，新的研究程序和文献评论技术被构造出来，并逐渐产生重要影响。

其主宰性的理论视角就是社会建构论（如Gergen, 2001），主宰性的研究路径就是话语社会心理学（Potter & Wetherell, 2006; 1987; Von Dijk, 1993）和修辞学（rhetoric）（Billig, 1996），而新的研究技术则是元分析（meta-analysis）（Rosenthal & DiMatteo, 2001）。

2. 不断凸显的新路径：进化路径、文化路径和社会认知神经科学

社会心理学一直不断地自我超越，以开放的心态融会其他学科的资源，持续拓展学科符号边界。换言之，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不断地实践新的研究路径（approaches or orientations）。进化路径、文化路径和认知神经科学是其中的典范路径。

进化路径和文化路径的导入，关联持续困扰的基本理论论争：是否存在统一而普遍的规律和机制以支配人类物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人类物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是否依其发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而呈现出特异性和多样性？这个基本理论论争，又可称之为普遍论—特异论（universalism vs. particularism）之论争。

依据回答这个论争的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作为整体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可被纳入三个不同的类别或范畴之中。第一个类别是以实验定向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基本的立场和态度是漠视这个



问题的存在，或视之为假问题。他们以发现普遍规律为己任，并把这一崇高职责视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学科认同的安身立命之所。因为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学的学子们在其学科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地遭遇跨时空的典范研究和英雄系谱。

第二个类别是以文化比较研究为定向的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不同文化语境中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使他们刻骨铭心。他们坚定地主张特异论的一极，并坚定地质疑普遍论的诉求。因为他们同样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文化嵌入性（cultural embeddedness）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且不断激发文化比较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奇妙的是，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特异性路径，从本世纪开始逐渐解体，而迈向文化动态建构论（Chiu & Hong, 2006; Hong et al., 2000）。

文化动态建构论路径，关涉每个个体的文化命运，如文化认知和知识激活、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等重大主题。我们每个个体宿命地生在某种在地的文化脉络而不是某种文化实体中。经过生命历程的试错，在文化认知的基础上，我们开心眼，滋心灵，育德行。但文化认知的能力，是人类物种的禀赋，具有普世性。假借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我们成长为人，并不断地修补和提升认知力。我们首先成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黄皮肤或黑白皮肤。

依靠不断修补和提升的认知力，我们逐渐穿越地方性的文化场景，加工异文化的体系，建构生动而动态的“多元文化的心智”（multicultural mind）（Hong et al., 2000）。异质的“文化病毒”，或多元的文化“神灵”，都“栖居”在我们的心智中，而表现出领域一特异性。几乎没有“诸神之争”，她们在我们的心灵中，都各就其位。

这些异质的“文化病毒”，或多元的文化“神灵”，她们不是暴君，也做不成暴君，绝对主宰不了我们的行为。因为先于她们，从出生时起，我们就被植入了自由意志的天赋。我们所终身刻苦的文化修行，只是手头待命的符号资源或“工具箱”（Swidler, 1986）。并且在行动中，我们练习“文化开关”的转换技能和策略，并能累积性地创造新工具或

新的“文化病毒”(Sperber, 1996)。

第三个类别是在当代进化生物学的理智土壤中生长而壮大的群体,即进化社会心理学家群体。他们蔑视特异论者的“喧嚣”,而把统一理论建构的雄心拓展至包括人类物种的整个动物界,以求揭示支配整个动物界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秩序和机制。以进化历程中的利他难题和性选择难题为核心,以有机体遗传品质的适应性(fitness)为逻辑起点,从1964年哈密尔顿开始,不同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如亲属选择论(kin selection/ inclusive fitness)、直接互惠论(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和间接互惠论(indirect reciprocal altruism)在利他难题上,亲本投资论(theory of parental investment)(Trivers, 2001)在性选择难题上被构造出来。而进化定向的社会心理学家把进化生物学遗传品质的适应性转化为行为和心智的适应性,进化社会心理学作为新路径和新领域得以成就(如Buss, 2007; 1994)。

认知神经科学和社会认知的融合,催生了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以神经科学的新技术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PET)为利器,社会认知的不同阶段、不同任务以及认知缺陷背后的大脑对应活动,正是最热点前沿(如Greene et al., 2001; Eisenberger et al., 2003; Ochsner, 2007)。

3. 个体内过程: 社会认知范式

在个体内水平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暖认知”(warm cognition)或“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为核心的“社会认知革命”(李其维, 2008; 赵蜜, 2010; Barsalou, 1999; 2005),有重要进展。其典范的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为洞悉人类心智的“黑箱”贡献了简洁武器,并且渗透在其他水平和其他主题的研究中,如文化认知、群体认知(Yzerbyt et al., 2004)和偏差地图(高明华, 2010; 佐斌等, 2006; Fiske et al., 2002; Cuddy et al., 2007)。

和特沃斯基合作,卡尼曼因为有关行动者在不确定境况中的判断启发式及其偏差的研究(Kahneman et al., 2008; 1982),而与另一位学者分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卡尼曼的研究使社会认知的路径贯注



在经济判断和决策领域中，行为经济学开始凸显。

4. 群体过程：社会表征范式

人际过程的研究，充塞着杂多的中层理论模型和小理论，并受个体内过程和群体过程研究的挤压。最有理论综合潜能的可能是以实验博弈论为工具的有关竞争和合作的研究。

当代群体过程的革新者是莫斯科维奇。在北美有关群体规范形成、从众以及权威服从的研究传统中，莫斯科维奇洞悉了群体秩序和群体创新的辩证法。莫斯科维奇的团队从1969年开始，在多数人的影响之外，专注少数人影响的机制。他以少数人行为风格的一致性为基础的皈依模型（conversion theory）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不断完善的大多数人和少数人影响的双过程模型（如 De Deru et al., 2001），重构了群体过程研究的形貌。莫斯科维奇有关少数人影响的研究经历，佐证了其理论的有效性（Moscovici, 1996）。

而社会表征论（social representation）则是莫斯科维奇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另一重大贡献（Moscovici, 2000）。他试图超越北美不同版本内隐论（implicit theories）的还原主义逻辑，解释和说明常识在社会沟通实践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社会表征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激发了丰富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如管健，2009；杨宜音，张曙光，2008；Doise et al., 1993；Liu, 2004；Marková, 2003），并熔铸在当代社会理论中（梅勒，2009）。

5. 群际过程：社会认同范式

泰弗尔的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革新了当代群际过程的研究。泰弗尔首先奠定了群际过程崭新的知识基础和典范程序：建构主义的群体观、对人际—群际行为差异的精妙辨析，以及“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实验程序。从1967年开始，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懈的艰苦努力，泰弗尔和他的团队构造了以社会范畴化、社会比较、认同建构和认同解构/重构为核心的社会认同论。社会认同论，超越了前泰弗尔时代北美盛行的还原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微观—利益解释路径，基于行动者的多元群体资格来研究群体过程和群际关系

(Brown, 2007; Tajfel, 1970; 1981; Tajfel & Turner, 1986)。

在泰弗尔于1982年辞世之后，社会认同论在其学生特纳的领导下，有不同版本的修正模型，如主观不确定性降低模型 (subjective uncertainty reduction model) 和最优特异性模型 (optimal distinctiveness model)。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特纳等人的“自我归类论”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Turner et al., 1987)。在自我归类论中，特纳构造了一个精妙构念——元对比原则 (meta-contrast principle)，它是行为连续体中范畴激活的基本原则 (Turner et al., 1987: 51-52)。所谓元对比原则，是指在群体中，如果群体成员之间在特定品质上的相似性小于差异性时，群体中沿着这个品质或维度就分化为两个群体，群际关系因此从群体过程中凸显。特纳的元对比原则，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一，它完善了其恩师的人际—群际行为差别的观念，使之转换为人际—群际行为连续体；其二，它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内群行为和群际行为的转化问题。

但社会认同论仍存在基本理论困扰：内群偏好 (ingroup favoritism) 和外群敌意 (outgroup hostility) 难题。不同的修正版本都没有解决这个基本问题。倒是当代社会认知的大家费斯克团队从群体认知出发，在刻板印象内容模型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 (Fiske et al., 2002) 中巧妙解决了这个难题，并在偏差地图 (bias map) (Cuddy et al., 2007) 中把刻板印象 (群际认知)、偏见 (群际情感) 和歧视 (群际行为) 融为一体。

典范意味着符号霸权，但同时也是超越的目标和击打的靶心。在社会认同范式的笼罩下，以自尊假设和死亡显著性 (mortality salience) 为核心的恐惧管理理论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 (张阳阳, 佐斌, 2006; Greenberg et al., 1997) 以及社会支配论 (social dominance theory) (Sidanius & Pratto, 1999) 被北美学者构造出来，尝试替代解释群际现象。它有两方面的意涵。其一，它意味着人格心理学对北美社会心理学的强大影响力；其二则意味着北美个体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精神气质期望在当代宏观社会心理过程中的借尸还魂，而这尸体就是腐败达